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李清集注

钱锺书选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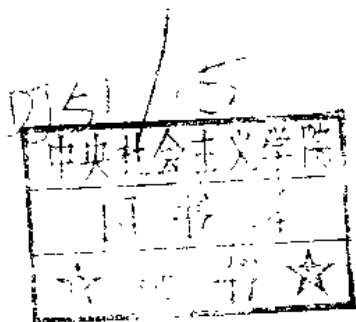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54598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 宗 谱 选 注

钱 锺 书 选 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封面设计：徐中益

宋诗选注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重庆出版社重印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5}{8}$  插页 2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2年7月重庆第1次印刷

印数 109,301—135,000

---

书号 10319·631

定价 0.92 元

## 序

關於宋代詩歌的主要變化和流派，所選各個詩人的簡評裏講了一些；關於詩歌反映的歷史情況，在所選作品的註釋裏也講了一些。這裏不再重複，只補充幾點。

宋朝收拾了殘唐五代那種亂糟糟的割據局面，能够維持比較長時期的統一和穩定，所以元代有漢唐宋爲『後三代』的說法〔一〕。不過，宋的國勢遠沒有漢唐的強大，我們只要看陸游的一個詩題：『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二〕。宋太祖知道『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會把南唐吞併，而也只能在他那張臥榻上做陸游的這場仲夏夜

1

〔一〕 郝經『陵川文集』卷十『溫公遺象』，趙沅『東山先生存稿』卷一『觀輿圖有感』第四首自註。

〔二〕 『劍南詩稿』卷十二。

夢。到了南宋，那張臥榻更從八尺方牀收縮而爲行軍帆布牀<sup>(一)</sup>。此外，又寬又濫的科舉制度開放了做官的門路，既繁且複的行政機構增添了做官的名額，宋代的官僚階級就比漢唐的來得龐大，所謂『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sup>(二)</sup>；北宋的『冗官冗費』已經『不可紀極』<sup>(三)</sup>。宋初有人在詩裏感慨說，年成隨你多麼豐收，大多數人還不免餓死；『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貧』<sup>(四)</sup>。最高增加到一百倍的收成只是幻想，而至少增加了五倍的冗官倒是事實，人民負擔的重和痛苦的深也可想而知，例如所選的唐庚『訊囚』詩就老實不客氣的說大官小吏都是盜竊人民『膏血』的賊。國內統治階級和人民羣衆的矛盾因國際的矛盾而抵觸得愈加厲害；宋人跟遼人和金人打仗老是輸的，打仗要軍費，打敗仗要賠款買和，朝廷只有從人民身上去榨取這些開銷，例如所選的王安石『河北民』詩就透露

(一)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炎興下峽』卷五十四載吳伸『萬言書』裏讀引了宋太祖那句話來勸宋高宗不要『止如東晉之南渡』。

(二) 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六上『三元寶疏』。

(三)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五『宋冗官冗費』條。

(四) 張詠『乖崖先生文集』卷二『僦廬』。

這一點，而李觀的『感事』和『村行』兩首詩更說得明白：『太平無武備，一動未能安……役頻農力耗，賦重女工寒……』，『產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平時不爲備，執事彼何人……』<sup>(1)</sup>。北宋中葉以後，內憂外患，水深火熱的情況愈來愈甚，也反映在詩人的作品裏。詩人就像古希臘悲劇裏的合唱隊，尤其像那種參加動作的合唱隊，隨着搬演的情節的發展，歌唱他們的感想，直到那場戲劇慘痛的閉幕，南宋亡國，唱出他們最後的長歌當哭：『世事莊周蝴蝶夢，春愁臣甫杜鵑詩』<sup>(2)</sup>。

作品在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裏產生，在他生活的現實裏生根立腳，但是它反映這些情況和表示這個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樣。單就下面選的作品而論，也可以看見幾種不同的方式。

下面選了梅堯臣的『田家語』和『汝墳貧女』，註釋引了司馬光的『論義勇六劄子』來印證詩裏所寫當時抽點弓箭手的慘狀。這是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我們可以參考許多歷史資料來證明這一類詩歌的真實性，不過那些記載儘管跟這種詩歌在內容上相符，到底只是

(1) 『李直講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2) 馬廷鸞『碧梧玩芳集』卷二十四『驅黎芳洲詩集』引了這兩句，還說：『所謂長歌之哀非耶？』

文件，不是文學，只是詩歌的局部說明，不能作為詩歌的唯一衡量。也許史料裏把一件事情敘述得比較詳細，但是詩歌裏經過一番提煉和剪裁，就把它表現得更集中、更具體、更鮮明，產生了又強烈又深永的效果。反過來說，要是詩歌缺乏這種藝術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鋪直敘，那末，雖然它在內容上有史實的根據，或者竟可以補歷史記錄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韻的文件，例如下面王禹偁對雪的註釋裏所引的李復『兵餽行』。因此，『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它的骨幹，然而假如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徵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彷彿要從愛克司光透視裏來鑑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

下面選了范成大的『州橋』，註釋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樓鑰和韓元吉的記載來說明詩裏寫的事情在當時並沒有發生而且也許不會發生。這是另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們愈加明白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於歷史考訂的事實，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學作品來供給歷史的事實。歷史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迹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穿鑿附會；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拋棄了它的創造的職權。考訂只斷定已然，

而藝術可以想象當然和測度所以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詩歌、小說、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sup>(一)</sup>。南宋的愛國志士最担心的是：若不趕早恢復失地，淪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習而相安，忘掉了祖國<sup>(二)</sup>。不過，對祖國的憶念是留在情感和靈魂裏的，不比記生字、記數目、記事實等等偏於理智的記憶。後面的一種是死記憶，好比在石頭上雕的字，隨你鑿得多麼深，年代久了，總要模糊銷滅；前面的一種是活記憶，好比在樹上刻的字，那棵樹愈長愈大，它身上的字跡也就愈長愈牢。從韓元吉的記載裏，看得出北方雖然失陷了近五十年，那裏的人民還是懷念祖國<sup>(三)</sup>。范成大的詩就是加強的表白了他們這種久而不變、隱而未申的愛國心，來激發家裏人的愛國行動，所以那樣真摯感人。

(一) 參看亞理斯多德『詩學』第一千四百五十一(乙)、一千四百六十(乙)。「左傳」宣公二年記載鉏麇自殺以前的獨白，古來好些讀者都覺得駭奇難以相信，至少嫌作史的人交代得不清楚，因為既然是獨白，「又誰聞而誰述之耶？」(季元度『天岳山房文鈔』卷一，『但露論』)。但是對於「長恨歌」故事裏「夜半無人私語」那橋情節，似乎還沒有人死心眼的問：「又誰聞而誰述之耶？」或者殺風景的指斥「臨邛道士」編造謊話。

(二) 例如「三朝北盟會編」『炎興下狀』卷六十八載楊道乞餉和獻疏，講到淪陷的人民，就說：「竊恐歲月之久，人心懈怠。」

(三) 參看李齊賢編『稼軒集抄存』卷一「乾道乙酉遊美芹十論」裏『觀畔』第三。



下面選了蕭立之的『送人之常德』，註釋引了方回的逸詩作爲參照，說明宋末元初有些人的心理是：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個桃花源去隱居，免得受異族的統治。這又是又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一首詠懷古跡的詩雖然跟直接感慨時事的詩兩樣，但是詩裏的思想感情還會印上了作者身世的標記，恰像一首詠物詩也可以詩中有人，因而幫助讀者知人論世。譬如汪藻有一首『桃源行』，裏面說：『那知平地有青雲，只屬尋常避世人……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求長年！』〔一〕這首詩是在『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崇道敬求神仙的時候作的〔二〕，寄託在桃花源上的諷諭就跟蕭立之詩裏寄託在桃花源上的哀怨不同。宋代有一首海外奇談之類的長詩，鄒浩的『悼陳生』〔三〕，詩很笨拙，但是敘述的可以說是宋版的桃花源〔四〕。有個寧波人陳生，搭海船上南通泰縣一帶，給暴風吹到蓬萊峯，看見山裏

〔一〕『浮溪集』拾遺卷三。

〔二〕黃震『黃氏日抄』卷六十六。

〔三〕『道鄉集』卷二。

〔四〕這傳奇開當時頗爲流傳，例如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三就有詳細的敘述，還說：『又聞舒信道嘗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南宋初康輿之『夢遊錄』記樓可試兄弟被考人引入『西京山中穴』，內有『大聚落』，可供隱居；也正是桃花源的變相。

修仙的『處士』，是唐末避亂來的，和『中原』不通消息；『于今天子果誰氏？』語罷默默如盲聾；這位陳生住了一程子，又想應舉做官——『書生名利淡肌骨，塵念日久生心胸』——因此那個處士用縮地法送他回去，誰知道『還家妻子久黃壤，單形隻影反匆匆』，陳生就變成瘋子。鄒浩從他的朋友章潛那裏聽到這樁奇聞，覺得秦始皇漢武帝求仙而不能遇仙，陳生遇仙而不求仙；『求不求兮兩莫遂，我雖忘情亦歛歔』；仲尼之門非所議，率然作詩記其事。鄒浩作這首詩的時候，宋徽宗還沒有即位，假如他聽到這個新桃花源的故事，又恰碰上皇帝崇道求仙、排斥釋教，以他那樣一個援佛入儒的道學先生，感觸準會不同，也許借題發揮，不僅說『非所議』了。鄒浩死在靖康之變以前，設想他多活幾年，嘗到了國破家亡的苦痛，又聽得這個新桃花源的故事，以他那樣一個氣骨頗硬的人，感觸準會不同，也許他的『歛歔』就要親切一點了。只要看陸游，他處在南宋的偏安局面裏，耳聞眼見許多人甘心臣事敵國或者攀附權奸，就自然而然把桃花源和氣節拍合起來（二），何況連殘山賸水那種託足之地都遭剝奪的蕭立之呢？

（一）『劍南詩稿』卷二十三『書陶靖節桃源詩後』：『寄奴談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晉鼎遷；獨爲桃源人作傳，固應不仕義熙年！』

宋代的五七言詩雖然真實反映了歷史和社會，却沒有全部反映出來。有許多情況宋詩裏沒有描叙，而由宋代其他文體來傳真留影。譬如後世闕傳的宋江『聚義』那件事，當時的五七言詩裏都沒有『探著』，而只是通俗小說的題材，像保留在『宣和遺事』前集裏那幾節，所謂『見於街談巷語』<sup>(一)</sup>。這些詩人十之八九從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經過科舉保舉，進身為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在民族矛盾問題上，他們可以有愛國的立場；在階級矛盾問題上，他們可以反對苛政，憐憫窮民，希望改善他們的生活。不過，假如人民受不了統治者的榨逼，真刀真槍的對抗起來，文人學士們又覺得大勢不好，忙站在朝廷和官府一面。後世的士大夫在詠梁山泊事件的詩裏會說官也不好，民也不好，各打五十板<sup>(二)</sup>；北宋士大夫親身感到階級利益受了威脅，連這一點點『公道話』似乎都不肯講。直到南宋滅亡，遺老像龔開痛恨『亂巨賊子』的『禍流四海』，纔想起宋江這種『盜賊之聖』來，彷彿爲後世李贄等對『忠義水滸傳』的看法開了先路。在北宋詩裏出現的梁山泊只是宋江

(一) 周憲，癸辛雜識續集卷上『龔開』宋江三十六贊。

(二) 魏禧，魏叔子詩集卷一『水滸』第二首：『君不擇臣，相不下士，士不求友，乃在於此！』

『替天行道』以前的梁山泊，是個風光明秀的地區(二)，不像在元明以來的詩裏是『好漢們一度風雲聚會的地盤』(三)。

宋詩還有個缺陷，愛講道理，發議論；道理往往粗淺，議論往往陳舊，也煞費筆墨去發揮申說。這種風氣，韓愈、白居易以來的唐詩裏已有，宋代『理學』或『道學』的興盛使它普遍流播。元初劉壎爲會輩的詩辯護，曾說：『宋人詩體多尙賦而比興寡，先生之詩亦然。故惟當以賦體觀之，即無憾矣』(三)。毛澤東同志『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以近代文藝理論的術語，明確地作了判斷：『又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同嚼蠟。』同時，宋代五七言詩講『性理』或『道學』的多得惹厭，而寫愛情的少得可憐。

(一) 例如宋庠『元憲集』卷十『坐蒼州亭上作』，亭下是梁山泊，水數百里；『長天野浪相依轉，落日殘雲共作紅；魚笛回環千艇合，菴蒲明滅百帆通』；韓琦『安陽集』卷五『過梁山泊』；蘇轍『轅城集』卷六『梁山泊』，又『梁山泊見荷花憶吳興』第五首：『孤濱出沒風波際，雁鴨飛鳴霧雨中；應爲高人愛吳越，故於齊魯作南風。』

(二) 例如『元詩選』三集庚幽友『把菊軒稿』，題宋江三十六人畫贊，劉基『誠齋伯文集』卷十七『分賦臨』，參看李贄『焚書』卷五，李涉『贈盜』(條)，王士禛『古夫于琴雜錄』卷五觀丘海石『過梁山泊』。

(三) 『隱居通議』卷七。

宋人在戀愛生活裏的悲歡離合不反映在他們的詩裏，而常常出現在他們的詞裏。如范仲淹的詩裏一字不涉及兒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詞就有『殘燈明滅枕頭欹，語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這樣悱惻纏綿的情調，措詞婉約，勝過李清照『一翦梅』詞『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又上心頭』。據唐宋兩代的詩詞看來，也許可以說，愛情，尤其是在封建禮教眼開眼閉的監視之下那種公然走私的愛情，從古體詩裏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體詩裏，又從近體詩裏大部分遷移到詞裏。除掉陸游的幾首，宋代數目不多的愛情詩都淡薄、笨拙、套板。像朱淑真『斷腸詩集』裏的作品，實在浮淺得很，只是魚玄機的風調，又添了些寒窘和迂腐；劉克莊稱讚李壁的『悼亡』詩『不可以復加矣！』〔一〕可是也不得不承認詩裏最深摯的兩句跟元稹的詩『暗合』〔二〕。以艷體詩聞名的司馬槲，若根據他流傳下來的兩首詩而論〔三〕，學李商隱而缺乏筆力，彷彿是患了貧血病和軟骨病的『西崑體』。有人想把詞裏常見的情事也在詩裏具體的描摹，不過往往不是陳舊，像李元膺

〔一〕『後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五。

〔二〕『後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

〔三〕陳起『前賢小集』拾遺卷五『聞怨』。

的『十憶詩』(二)，就是庸廓，像晁沖之『都下追感往昔因成二首』(三)，都還比不上韓偓『香奩集』裏的東西。

## 二

南宋時，金國的作者就嫌宋詩『衰於前古……遂鄙薄而不道』，連他們裏面也有人覺得『不已甚乎！』(三)從此以後，宋詩也頗嘗過世態炎涼或者市價漲落的滋味。在明代，蘇平認為宋人的近體詩只有一首可取，而那一首還有毛病(四)，李攀龍甚至在一部從商周直

(一) 見『愚莊漫錄』卷五。

(二) 『具茨先生詩集』卷十三。

(三) 王若虛『滌南遺老集』卷四十。王若虛是師法白居易的，所以他說宋詩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算得一句平心之論，正像羅佑『歸田詩話』卷上論『舉世宗唐恐未公』或者葉燾『已畦文集』卷八『黃葉村莊詩序』和『原詩』卷一論『因時善變』或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四引申都穆『南濠詩話』那幾節一樣，因為那些也都是不學宋詩的。

(四) 萊盛，水東日記『卷十記蘇平語』：那首詩是王珪的『恭和御製上元觀燈』，見『藝陽集』卷四。

到本朝詩歌的選本裏，把明詩直接唐詩，宋詩半個字也插不進（二）。在晚清，『同光體』提倡宋詩，尤其推尊江西派，宋代詩人就此身价十倍，黃庭堅的詩集賣過十兩銀子一部的辣價錢（三）。這些舊事不必多提，不過它們包含一個教訓，使我們明白：批評該有分寸，

（二）『古今詩刪』卷二十二以李建勳和靈一結束，卷二十三以劉基開始；參看屠隆『鴻苞集』卷十七；『宋詩河漢』，不入口裁，又陳子龍『陳忠裕全集』卷二十五『皇明詩選序』說宋詩『既窮詩等不是同類，而是異物』。就因為討厭何、李、王、李等前後『七子』的『復古』，明代中葉以後的作者又把宋詩抬出來，例如『公安派』排得宋詩超過唐詩，捧捧蘇軾高出杜甫——參看袁宏道『瓶花齋集』卷九『答陶石澗』、陶望論『敬庵集』卷十五『與袁六休書』之三；又譚元春『東坡詩選』載袁宏道跋，卷一『真興寺閣』、『石簪符醉題堂』，卷五『隨眼醫王彥咨』附袁宏道評語。黃宗羲『明文授讀』卷三十六所載葉向高『王亦泉詩序』，卷三十七所載何喬遠『鄭道圭詩序』、『吳可觀詩草序』和曾異撰『徐叔子山房次韻詩序』也全是致敬於『七子』的『復古』而褒揚宋詩的，同時使我們看出了清初黃宗羲、呂留良、吳之振、陳詩等人提倡宋詩的淵源。有趣的，許多宋人詩句靠明代通俗作品而推廣，只是當時的讀者未必知道是宋詩。舉三個顯著的例：『荷花蕩』第三折裏玉帝說的『淡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鵲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是蘇軾『上元侍飲樓上月同別』第三首，見『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十六；『鵲臨洲』第三折裏女巫說的『暖日驚楊柳，濃春醉海棠；放慵真有味，應俗苦相妨』是陳與義『放慵』前半四句，見『簡齋詩集』卷十；『金瓶梅』第八十四回的『正是：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福窟即江山』是黃庭堅『王厚頌』第二首後半兩句，見『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十五。參看宣統二年『小說時報』第六期『息樓談餘』記載贛州清音班唱本裏所用黃庭堅的各聯詩句。

（三）『施山』『蕪湖雜記』卷六。

不要失掉了適當的比例感。假如宋詩不好，就不用選它，但是選了宋詩並不等於有義務或者權利來把它說成頂好、頂頂好、無雙第一，模倣舊社會裏商店登廣告的方法，害得文學批評裏數得清的幾個讚美字眼兒加班兼職、力竭聲嘶的趕任務。整個說來，宋詩的成就在元詩、明詩之上，也超過了清詩。我們可以誇獎這個成就，但是無須誇張、誇大它。

據說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在東宮的時候，每聽到他父王在外國打勝仗的消息，就要發愁，生怕全世界都給他老子征服了，自己這樣一位英雄將來沒有用武之地。緊跟著偉大的詩歌創作時代而起來的詩人準有類似的感想。當然，詩歌的世界是無邊無際的，不過，前人佔領的疆域愈廣，繼承者要開拓版圖，就得配備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遼遠，否則他至多是個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業之君。所以，前代詩歌的造詣不但是傳給後人的產業，而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向後人挑戰，挑他們來比賽，試試他們能不能後來居上、打破記錄，或者異曲同工，別開生面。假如後人沒出息，接受不了這種挑戰，那末這筆遺產很容易貽禍子孫，養成了貪吃懶做的膏粱紈袴。有唐詩作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這個好榜樣，宋代詩人就學了乖，會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時，有了這個好榜樣，他們也偷起懶來，放縱了摹仿和依賴的惰性。瞧不起宋詩的明人說它學唐詩而



不像唐詩(二)，這句話並不錯，只是他們不懂這一點不像之處恰恰就是宋詩的創造性和價值所在。明人學唐詩是學得來維肖而不維妙，像唐詩而又不是唐詩，缺乏個性，沒有新意，因此博得『瞎盛唐詩』、『贗古』、『優孟衣冠』等等綽號(三)。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築的道路延長了，疏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會冒險開荒，沒有去發現新天地。用宋代文學批評的術語來說，憑藉了唐詩，宋代作者在詩歌的『小結裏』方面有了很多發明和成功的嘗試，譬如某一個意思寫得比唐人透澈，某一個字眼或句法從唐人那裏來而比他們工穩，然而在『大判斷』或者藝術的整個方向上沒有什麼特著的轉變，風格和意境雖不寄生在杜甫、韓愈、白居易或賈島、姚合等人的身上，總多多少少落在他們的勢力圈裏(三)。這一點從下面的評述和註釋裏就看得出來。鄙薄宋詩的明代作者對這點推陳出新都皺眉搖頭，恰像做算學，他們不但不許另排公式，而且對前人除不盡的數目，也不肯在小數點後多除幾位。我們不妨

(一) 例如何景明『何氏集』卷二十六『讀』精華錄：『山谷詩自宋以來論者皆謂似杜子美，固余所未喻也。』

(二) 參看于慎行『穀城山館文集』卷十一『滿宗伯詩序』：『如畫師寫照，……無一不似，……了無生意，……似之而非其真矣。』又『朱光祿集序』：『大者摹擬篇章，小者剽剝字句，……形狀神策，……這是曾受『七子』影響的一位過來人的話。』

(三) 這兩個術語見方回『瀛壖卮言』卷十『姚合』游春『批語』，參看卷十五『陳子昂』曉次樂鄉縣『批語』。